

抗戰時期的 國軍人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8)

張瑞德 著

Monograph Series No. 68



Anatomy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1937-1945

Chang Jui-t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 刊(68)

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

張 瑞 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 / 張瑞德著. -- 一版. --

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民82

面； 公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8)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671-137-1 (平裝)

1. 軍事 - 行政 - 中華民國

591.8

9501194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8)

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

著 者／張瑞德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30號

電 話：(02)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戶 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印 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五股鄉五權路69號

電 話／(02)2299-2060

初 版／中華民國82年6月

一版二刷／中華民國95年7月

定 價／新臺幣2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671-137-1 (平裝) GPN1009501684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組成分子的分析	5
第一節 高級軍官	5
第二節 中下級軍官	19
第三節 士兵	31
第二章 人事制度的運作	41
第一節 任免	41
第二節 升遷調補	57
第三節 獎懲考績	77
第四節 待遇福利	88
第五節 退役撫卹	102
第三章 中央與地方軍系人事的關係	111
第一節 中央採取的措施	112
第二節 地方軍系的反應	117
第三節 中央化的影響	121
結 論	125
徵引書目	135
索 引	159
後 記	163

前　　言

1977 年，美國維吉尼亞軍校 1927 年班的學生，為了紀念畢業五十週年，特別出版了一本紀念冊，凡是能够聯絡得到的同學，大部份都不能免俗的寫了一篇短文。一位中國籍的同學 Ngan Ben Chow，在紀念冊上是這樣寫的：

我 1927 年畢業後回到中國，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混亂的狀態，軍閥割據，土匪掠奪於鄉間，中央政府無能為力，我也面臨種種困難。我好像到了外國，一切都需從頭開始，我願意接受任何職位，不管官階的高低，仍是走投無路。雖然我是廣東人，但家鄉偏僻，我說的方言並不普及，所以當我到廣州時，必須先學廣府的語言，後來到其他省份，還要學其他的各種方言——現在則通行國語。我終於找到一個位置，在蔣委員長（後來曾任中華民國的總統）麾下服務，大部分時間在戰場度過，曾參加北伐、剿共和抗日，而且曾一度負了傷，並且被日軍俘虜達六個月之久，最後倅能逃跑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率領軍事代表團到香港，後來復員，在那裏開了一家餐館，並且辦了一間私立中學。總之，我這一生沒有什麼大的建樹，但也無愧於母校。①

① *50th Reunion Book of the Class of 1927,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n.p., 1977). 本項資料係由揭鈞教授提供，謹此致謝。中譯文曾參考：揭鈞，「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臺北：躍昇，1991年），頁 59-60。

根據其他資料顯示，這位中國留學生應是周雁濱，廣東開平人，1901年生，在維吉尼亞軍校就讀時與孫立人係同期同學，自美國學成歸國後服務軍中，1935年5月敍任步兵中校，時任財政部稅警總團上校團長，1947年11月升任少將。^②上面的這段短文顯示，這位懷才不遇的留學生在回顧畢業以後的五十年生涯時，最令他印象深刻的經驗，居然是回到中國後找工作時所受到的挫折。留學生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固然是鳳毛鱗角，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挫折的經驗並不是屬於他一個人所獨有，也不是屬於他那一代的人所獨有；他所描述返國後所見到的政治、社會情況，可以說是北洋時期以後中國的一個縮影。1927年他開始找工作時，「必須先學廣府的語言，後來到其他省份，還要學其他的各種方言」；事實上，直至抗戰爆發前夕，國軍仍不是一支真正屬於國家的軍隊——東北軍有東北軍的編制，川、滇、黔、桂軍也各自有其絕不畫一的編制，即使是中央直接統轄的部隊，也因為歷史淵源的不同，而有二、三種的編制；至於餉章也和編制相同，各個地方部隊均有其不同的餉章，如此一來，官兵生活固然談不上平等待遇，而辦理軍需的人員，對於軍費的預算，更是無從著手辦理。^③抗戰時期，各種人事制度漸上軌道，但是仍多遷就事實，不能完全按照規定辦理，甚至廣東名將薛岳在湖南擔任

② 有關周雁濱的傳記資料，可參閱：軍事委員會銓敍廳編，〔第一期第一屆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名簿〕，第1冊（南京：編者印行，1935年），頁194；劉國銘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政職官人物誌〕（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頁752。

③ 何應欽，「統一與救國」，收於：何應欽將軍講詞選輯編輯委員會編，〔何應欽將軍講詞選輯〕（臺北：臺北何氏宗親會，1969年），頁40-41。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時，重要的軍事會議仍然是採用粵語進行。④因此，這時候的中國仍然是許多中國人的外國。

眾所週知，軍隊的構成，自然不外人員和裝備，進步的機械化裝備，固然是現代化武力的基本條件，而運用其裝備，卻依賴其人員，故建軍不能僅注意裝備，而更需要注意人員的任免、升遷調補、獎勵懲戒、待遇福利，才能使人員的動員補充、任用調免，運用靈活，適時發揮新陳代謝的作用，讓進者稱職，退者得所，進而提高戰力。如果人事制度運用得好，上下一心，不惜犧牲，則用較差的武器往往也可以擊敗有精良武器的敵人；反之，即使有良好的武器裝備，但是沒有良好的人事制度，人員不能稱職，也不能發揮武器的力量。1951年8月，參謀總長周至柔在實踐學社對軍官訓練團學員演講人事制度時曾說過：

過去我們都只知道軍隊的戰鬪力量是由訓練而來的，不知道戰鬪力的高低和人事制度的良窳，有很大的關係，結果處處是怨言，處處使人不滿；你不佩服我，我不佩服你；你排擠我，我排擠你。人的力量互相抵消，而不能相輔相成，在戰場上就不能互相合作，互相支援，這樣的軍隊，自然只有失敗一途了。⑤

這段話固然簡化了國軍在大陸時期失敗的原因，但是卻正確的指出了研究國軍的人事制度，實為瞭解其體質與戰力的重要工作。

④ 黃仁宇，「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收於：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1988年），頁266。

⑤ 周至柔，〔軍事制度之研究（第二講）〕（臺北：實踐學社，1951年），頁22-23。

關於此一問題，近人的著作多僅略為提及，^⑥ 尚缺乏深入的研究，^⑦ 本文擬探討抗戰時期陸軍各階層人員的組成與素質，以及任免、升遷、調補、獎懲、待遇福利、退役、撫卹等制度實際運作的情形，檢討其所面臨的困難，並且對其成效加以評估。抗戰時期的國軍，雖包括陸、海、空軍，但是由於海、空軍的人數和重要性均無法和陸軍相比，因此本書不予討論；又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書所討論的對象僅限於陸軍的軍官、軍佐和士兵，並不包括軍屬。至於共軍，筆者以其性質特殊，和其他一般國軍有極大的不同，因此也不擬討論。

-
- ⑥ 例如：徐乃力，「抗戰時期國軍兵員的補充與素質的變化」，〔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頁44-56；Evans Fordyce Carlson, *The Chinese Army: 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chap. 6; F.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146-152; 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 98-106, 228-33;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 6; Diana Lary, *Warlord Soldiers: Chinese Common Soldiers, 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s. 1-2; Lloyd E. Eastman, Jerome Ch'en, Suzanne Pepper, Lyman P. 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8-143.
- ⑦ 少數專門討論國軍人事制度的論文，均係敘述各項制度的沿革，對於制度實際運作的情形，著墨不多。參閱：沈懷玉，「軍職制度」，收於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公職志（初稿）〕（臺北：編者印行，1990年），頁393-582；劉岩，「民國時期軍隊的人事管理制度」，〔軍事史林〕，1990年第3期，頁33-37。

第一章 組成分子的分析

軍隊成員素質的好壞，和軍隊戰力的高低有直接的關係。一支軍隊如果成員素質低弱，即使部隊的人數眾多，其戰力也不能強大。以下爰將抗戰時期的陸軍軍官分為高級（將級）軍官和中、下級（校、尉）軍官和士兵三類，對其出身背景和素質分別加以討論。

第一節 高級軍官

一、出身背景分析

研究抗戰前後國軍將級軍官的人事問題，最完整且最權威的原始名冊，應為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編製的〔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名簿〕（1936年出版），^①收錄有1,247名陸軍將領資料；以及國防部第一廳所編的〔現役軍官資績簿〕（1947年出版），收錄有陸軍將級軍官3,274人。根據以上兩種資料，我們可以為抗戰前及抗戰後期的將級軍官，各畫出一幅素描。

① 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編，〔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名簿〕（南京：編者印行，1936年）。

表1 陸軍將級軍官出身背景統計（1936）

出身\官階	總計 (%)	上將 (%)	中將 (%)	少將 (%)
黃 埔	92(7.38)	0(—)	17(5.65)	75(8.19)
保 定	388(31.11)	8(28.81)	95(31.56)	285(31.15)
留 學	159(12.75)	6(19.35)	51(16.94)	102(11.15)
陸 大	215(17.24)	2(6.45)	43(14.29)	170(18.58)
地方軍校及行伍	393(31.52)	15(48.39)	95(31.56)	283(30.93)
總 計	1,247(100.00)	31(100.00)	301(100.00)	915(100.00)

資料來源：根據軍事委員會銓敍廳編，〔陸海空軍軍官佐官名簿〕，第1冊（南京：編者印行，1936年），頁1-138，收錄資料計算得出。

表2 陸軍將級軍官出身背景統計（1947）

出身\官階	總計 (%)	上將 (%)	中將 (%)	少將 (%)
黃 埔	1,150(35.13)	1(2.70)	76(11.88)	1,073(41.31)
保 定	280(8.55)	14(37.84)	97(15.16)	169(6.51)
留 學	284(8.67)	10(27.03)	67(10.47)	207(7.97)
陸 大	1,197(36.56)	3(8.11)	337(52.65)	857(33.00)
地方軍校及行伍	362(11.06)	9(24.32)	63(9.84)	290(11.17)
不 詳	1(0.03)	0(—)	0(—)	1(0.04)
總 計	3,274(100.00)	37(100.00)	640(100.00)	2,597(100.00)

資料來源：根據國防部第一廳，〔現役軍官資績簿〕（南京：編者印行，1947年），第1冊～第4冊，收錄資料計算得出。

從以上二表，可以發現以下幾項現象：

第一，戰前陸軍的將官出身黃埔者極少，且出身黃埔的比例乃是隨著階級高低成反比。至 1947 年，將官出身黃埔者已有顯著增加，其比例也是隨著階級的高低而成反比，少將出身黃埔者已佔多數（出身陸大及外國軍校者，也多係黃埔畢業）。

第二，戰前陸軍的將官出身保定者頗多，約和出身地方軍校及行伍者相當；出身保定的將官，以中將和少將較多，上將則較少，原因或許是保定成立較晚之故。抗戰結束後，將官出身保定者，已有顯著減少，少將出身保定者尤少，原因為保定軍校已於

表 3 戰前陸軍重要軍職人員出身背景統計

出身＼職稱	各路軍總司令	軍長	師長
黃 埔	0(0%)	7(10%)	20(11%)
保 定	4(67%)	25(35%)	36(20%)
留 學	0(0%)	1(1%)	6(3%)
陸 大	0(0%)	2(3%)	9(5%)
地方軍校及行伍	2(33%)	35(49%)	63(36%)
不 詳	0(0%)	1(1%)	43(24%)
總 計	6(100%)	71(100%)	177(100%)

資料來源：根據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編者印行，1984年），下冊，頁 675-695；劉鳳翰，「抗戰前期國軍之擴展與演變（陸軍部分：一九三七·七～一九四一·八）」，收於：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研討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臺北：編者印行，1991年）二文所附名單計算得出。

1924年停辦。

第三，將官出身陸大及國外軍校者，不論是戰前或戰後，比例均小。

第四，將官出身地方軍隊及行伍者，在戰前約和出身保定者相差無幾，上將出身地方軍隊及行伍者尤多。至抗戰結束後，將官出身地方軍校及行伍者，已大為減少。

以上係抗戰時期將官出身背景的一般趨勢。以下擬再就陸軍重要軍職人員（戰前的各路軍總司令、軍長、師長和戰時的戰區正副司令長官、集團軍正副長官、軍長、師長）的出身背景加以分析。

表4 陸軍重要軍職人員出身背景統計(1944)

出身＼職稱	戰區正副司令長官	集團軍正副總司令	軍長	師長
黃 埔	1(3%)	31(33%)	40(36%)	132(42%)
保 定	18(50%)	36(35%)	37(33%)	48(15%)
留 學	4(11%)	5(5%)	0(0%)	0(0%)
地方軍校及行伍	13(36%)	23(24%)	34(31%)	101(32%)
不 詳	0(0%)	0(0%)	0(0%)	33(11%)
總 計	36(100%)	95(100%)	111(100%)	314(100%)

資料來源：*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 230

作者所根據的資料為〔陸軍軍官佐資績簿〕(1944)，其中軍、師長無一人係留學歸國者，統計數字疑有誤。

從以上二表，可以發現以下幾種現象：

第一，戰前重要軍職人員出身黃埔者極少，各路軍總司令中

無一人係黃埔畢業，軍長、師長中也只有約十分之一是出身黃埔。至抗戰後期，各戰區正副司令長官中，雖然仍只有一人係黃埔畢業，但是戰區正副司令長官以下的重要軍職人員，出身黃埔者已有顯著增加，且職務越低的重要軍職人員出身黃埔的比例越高，如集團軍正、副司令有33%畢業於黃埔，軍長和師長中則各有36%和47%出身黃埔。

第二，戰前重要軍職人員出身保定者頗多，且職務越高者，出身保定者越多，如各路軍總司令中出身保定者佔三分之二，軍長中出身保定者佔37%，師長中出身保定者佔20%，至抗戰後期，也有類似的現象。戰區正、副司令長官中有50%出身保定，集團軍正、副司令中有38%；至軍長階層則只有33%，比不上出身黃埔的多：至師長階層，更只佔17%。

第三，重要軍職人員出身陸大及國外軍校者，不論在戰前或戰時均少。

第四，重要軍職人員出身地方軍校及行伍者，不論在戰前或戰時，均在三分之一以上，顯示戰時重要軍職人員素質的提昇有限。

二、成員素質的分析

綜合以上對於抗戰前後陸軍一般將領及重要軍職人員出身背景的分析，可以發現以下幾項趨勢及涵義：

第一，抗戰期間陸軍將領有「黃埔化」的趨勢，戰前保定所佔的重要地位，戰時逐漸為黃埔所取代，在直接掌握兵權的軍長、師長階層，這種趨勢尤為明顯。抗戰時期出身黃埔的將領，大多畢業於前幾期，當時黃埔的訓練相當粗淺，時間也短，所學

到的專業技能自然有限。

第二，抗戰期間陸軍將領（含重要軍職人員）出身地方軍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現象，顯示戰時將領的素質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種兵將領的素質較差，如主管後勤業務的將領，絕大多數畢業於直隸經理學堂（民國以後改為陸軍軍需學校），然後在北洋部隊任職；騎兵和通訊兵的將領，也絕大多數是出身北方部隊的舊式軍人。^②這些出身地方軍校或行伍的將領，或許極為勇敢、戰場經驗豐富，但是對於現代戰爭的性質，卻普遍缺乏認識。

第三，抗戰期間陸軍將領出身國外軍校者甚少，而且多係一次大戰期間或一次大戰前出國留學者，因此對於一次大戰以後的軍事科技和戰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認識。^③雖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的將領所受訓練，一般說來仍較其他將領為紮實。

第四，抗戰期間陸軍將領出身陸大者也甚少。陸大為國軍深造教育的主要機構，但是畢業人數有限。據統計，至抗戰結束時，陸大畢業軍官在軍中共 2,100 人，分佈狀況如下：1. 中央軍事機構約有 600 人，其中以陸大及所屬的參謀訓練班人數最多。2. 戰鬥序列各單位共約 1,500 人，其中每一戰區司令部約有 10 人，每一集團軍總部約 3—5 人，每一軍司令部約 3—5 人，每一師司令部約 2—3 人，兵站機關共約 120 人左右。^④陸大所學

^② 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 66.

^③ Ibid.

^④ 楊學房，「陸大沿革史編後感言」，收於：楊學房、朱秉一合編，〔中華民國陸軍大學沿革史〕（臺北：三軍大學，1990年），頁284-285。

者，以師戰術爲主，對大軍作戰的指揮作業磨練較少，對軍事作戰以外的政治作戰、經濟作戰、心理作戰，更無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學生，派赴部隊後，接受實際的戰場磨練，而能有優異的表現。^⑤至於陸大畢業生擔任參謀職務者的表現，一般認爲陸大出身的參謀長或參謀處長、主任，指揮多比較得體。^⑥

抗戰時期的陸軍將領，自離開學校後，除了短期的訓練班隊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機會繼續接受兵科學校和陸大的正規深造教育。在先進國家的軍隊中，軍校畢業後尚可由機關、學校、部隊的輪調中學習新技能，但是中國的軍官卻無此機會。此外，國民革命軍自成立以後，由於連年作戰，因此升遷容易，常是一戰一升官，也減少了歷練的機會。戰前德國顧問對國軍此種快速升遷的方式即引以爲憂，多次向蔣中正陳述，認爲一個軍人如果不先任下級軍官，遍充排、連、營、團長各職多年，必定不能於短期之內具有高級指揮官的經驗，即使是如何勇敢，也無濟於事。^⑦抗戰時期，由於人員傷亡大，加以部隊屢次擴編，因此許多人升至將官時仍很年輕。據統計，1944年時，陸軍一般高級將領，年齡大多在五十歲以下，有些總司令、軍長、師長的年齡，甚至只有三、四十歲，而當時日軍一般將官的年齡，則大多在五十歲以上。^⑧少年得志，自然容易產生驕傲自滿、不求進步的毛病。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即和俄國立國之初的歷史十分類似，

⑤ 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學述憶之片段」，收於：楊學房、朱秉一主編，〔中華民國陸軍大學沿革史〕，頁 174-175。

⑥ 〔審核第二次視察部隊參謀報告書〕，油印本，1941年，頁12，收於軍令部檔案，檔號 769/2217。

⑦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德國軍事顧問佛采爾關於整頓中國軍隊致蔣介石呈文兩件」，〔民國檔案〕1988年第4期，頁39。

⑧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 230.

但是俄國和中國截然不同的是，俄國軍官的教育程度，在革命後大有提昇，如一位學者即認為紅軍軍官的軍旅生涯中，有一半是在各級軍事學校中渡過的。在軍事學術快速進步的二十世紀，國軍的高級軍官被迫以二十年前所學的知識，和他們範圍有限的經歷，去應付現代戰爭的複雜問題，戰力無法提昇是可以預期的。^⑨

抗戰後期，美國先後派遣來華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對於國軍高級軍官的素質，即每多表示不滿，如他在 1942 年 5 月 26 日呈委員長文中即曾表示國軍軍官的素質和其階級、職務成反比：「低級軍官對於命令，每能迅速執行；營長和團長的素質不一，但是不乏優秀之士。在這些階層要將缺乏效率者淘汰較為容易，擢優棄劣後，對於士氣將有好的影響。至於軍長和師長，則問題頗大。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們很少親臨前線，更極少監督命令是否執行。對於來自前線誇大甚至錯誤的報告，不經查證即予接受。經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亂。一般的師長，似乎以為只要自距離前線五十哩處，發一命令，即已盡到責任。這些軍官中，有許多是相當勇敢，但是大多數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氣。」^⑩接替史

^⑨ 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47.

^⑩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 153. 軍界人士指出，抗戰中各大、小戰役，軍、師長所居位置，通常為距火線 5~6 華里，約為敵軍山野砲的射程之外；集團軍總部通常設於距火線 19~20 華里處；至於戰區司令長官部，則通常設於距戰場 200~300 華里的重要城鎮。參閱 1993 年 1 月 7 日胡靜如先生與筆者私人通信。